

大众传媒与 政治变迁

——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

赵永华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大众传媒与 政治变迁

——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

赵永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 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 / 赵永华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68 - 3505 - 3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大众传播—传播媒介—关系—政治制度—变迁—研究—独联体 IV. ①G206. 2 ②D751. 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0933 号

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

赵永华 著

责任编辑 宋 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3A 设计艺术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厂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字 数 315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505 - 3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探讨了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变迁的关系问题，重点研究了处在变革与转型中的独联体本土传媒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大众媒体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廓清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传媒体制特点和媒体发展情况。

一、问题的由来与研究意义

21 世纪初，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的“颜色革命”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剧变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反对派们获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造成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内部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然而本国的新闻政策、舆论导向，以及西方传媒的宣传鼓噪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本书所研究的正是独联体国家大众传媒以及外国传媒对“颜色革命”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开展了对独联体国家转型新闻体制的系统研究。目前，我国新闻业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仍面临着西方传媒的不断渗透，发生“颜色革命”的独联体三国在新闻改革、媒介发展、政治传播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国内的新闻业发展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无论是历史上的苏联东欧剧变，还是如今的“颜色革命”，都引起了我国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特别是 2005 年 3 月的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由于该国与我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尤其令人瞩目。“颜色革命”向中亚的蔓延给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挑战。而我国始终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分化、西化、弱化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应从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事件中得到启示和吸取教训，从新闻立法、新闻自由、舆论控制、外资准入等方面思考应对之策，这也正是本研究最后的落脚点。

苏联解体以后，独联体各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朝着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综观独联体各国二十年来大众传媒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政治的走向，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新闻媒介与独联体各国的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很大的关联度。无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颜色革命”，以及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吉尔吉斯斯坦骚乱，大众媒介都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对事态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造成独联体国家根本制度的改变、政权的更迭、局势的动荡。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变动再次证明，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环，不仅是政治发展的晴雨表，而且反过来又对政治发展产生极大的能动作用。

在转型新闻体制下，独联体国家传媒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得到突显，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崭新而且重要的研究课题。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及西欧的研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有着持续的关注，而中国学者则关注较少。此种研究现状与该问题对我国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不相适应。对于独联体国家的传媒变迁以及传媒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国学者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本书从中国的视角对大众传媒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阐释，以此丰富政治传播理论的内容。

二、本书的内容结构与主要观点

本书由四部分共八章的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即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探讨了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爆发背景、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的关系机制。第一章，对“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作了界定和解释，分析了“颜色革命”产生的内部机制原因和外部影响因素；第二章，以政治传播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理论框架，并从总体上分析了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的关系。

第二部分，即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三章分别对发生“颜色革命”的独联体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闻业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对这些国家的本土媒体在“颜色革命”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即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这部分主要探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传媒对“颜色革命”的助推作用，选取《纽约时报》为样本，对其“橙色革命”报道进行了框架分析。

第四部分，即本书的第八章。该章简要分析了“颜色革命”在传媒政策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方面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指出“颜色革命”事件对中国新闻业管理的启示意义，从媒体管理角度提出了七项举措。

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如下：

1. 关于独联体国家独立后的新闻体制转型与媒介发展现状

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脱离苏联母体后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在新闻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党报体系不复存在。经过20年的发展，独联体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闻发展模式。但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力倡导新闻自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初期前总统阿卡耶夫本人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积极倡导者和捍卫者。独联体国家奉行新闻自由政策，法律上允许所有政党和个人创办新闻媒体，为反对派利用传媒推翻现政权大开方便之门。独立后，各国出现了不少民营的商业媒体，官方出版物在激烈的竞争中每况愈下。在舆论多元化的口号下，“民主”、“自由”的独立媒体呈现出“放荡不羁”的状态。以上情形为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提供了便利的舆论环境。

当前，格鲁吉亚的绝大多数媒体是私营媒体，只有极少数是国营媒体。格鲁吉亚的纸质媒体财政困难，政治分野明显。广电媒体实行公营、私营双轨并行的体制。格鲁吉亚当下实行的是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原则，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媒体。格鲁吉亚在传媒转型过程中显现出如下矛盾与问题：观念先进，而业务落后；媒体从业者缺乏专业性，传媒业的整体业务水平低下。

库奇马当政时期，与其他两个国家相比，乌克兰政府对传媒的监管相对严格。独立后，乌克兰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证大众媒介的正常运行。国家为大众媒体提供资金支持，为媒体从业人员提供等同于国家公务员的社会保障。通过对媒体的监管，力求达到信息空间的一致。乌克兰大众媒体对权力机构和总统一般比较信任，总统的观点一般作为判断事件正确与否的标准，媒体尤其是国营媒体对此很少提出质疑。除了政治因素的作用，乌克兰的大部分媒体及其报道也深受金融、工业集团的影响，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国内的金融、工业集团和政治派别。

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与政权的关系对于媒体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国有媒体的运行秩序是在国家管理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吉尔吉斯斯坦新闻业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媒体专业人员的缺失。

2. 关于独联体国家本土传媒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与影响

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等观念被确立为立国之本的情况下，在“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中独联体国家本土新闻媒介宣扬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主张和要求。在“颜色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各个派别尤其是反对派利用手中的媒体大造声势。独联体国家通过立法允许任何政党和个人创办大众传媒，为反对派提供了合法的讲坛。大众媒介成为反对派反对现政权、抨击政府、发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

2003年“玫瑰革命”中，格鲁吉亚的新闻媒体深度介入此次政治事件。大众传媒放弃了中立观察员的身份和作用，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几乎所有的格鲁吉亚媒体都发挥了政治鼓动、效忠某一党派或进行外部指导的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玫瑰革命”结束之后。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持续报道带动了普通民众对事件的关注，并影响了政治事件的进程。诸多学者认为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报道，为反对派上台奠定了基础。在“玫瑰革命”中，官方媒体被边缘化是“革命胜利”的另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西方媒体、反对派媒体和所谓“独立”媒体往往站在同一阵线上，对当局进行批评与揭露，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

有专家指出，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反对派尤先科的支持者们比亚努科维奇的拥护者们更加有效地使用了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更加懂得如何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功能，让公共舆论场充满反对派所需要的言论。与反对派相比，大多数后苏联国家的领导者们并没有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橙色革命”中，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倒戈，主流电视媒体集体倒向反对派。乌克兰“传媒界的橙色革命”并非是传媒人的一时兴起所致，而是因为媒体工作者与政府积怨已久。“橙色革命”中，互联网开始突显作用，尤先科和他的竞选总部注册了大量网站，内容实时更新。当时，在乌克兰的网络上弥漫着“革命”的情绪，“橙色阵营”的论调在网络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中，虽然反对派媒体数量不多，且受到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压制，但是他们却成功地把当局的“腐败”形象广泛地传播给大众。许多独立媒体接受了美国的资金援助，也在吉尔吉斯斯坦传播反对派的声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有媒体因为在财政上羸弱无力，使得“郁

金香革命”中信息战爆发后政府的声音不能向外传播,无法掌握国内舆论的主导权,以至于将舆论高地拱手让给了反对派媒体和独立媒体,一边倒的舆论最终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3. 关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

在独联体国家大众传媒走向商业化、市场化道路之时,西方资本开始进入独联体各国新闻领域。它们或创办自己的媒体,或向独联体本土媒体渗透,在“颜色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煽动作用。美国利用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中对当事国实施媒介“轰炸”,给当权者贴上“独裁”、“反民主”、“反人道”、“违反‘人权’”等标签,为反对派夺权提供依据。同时,不厌其烦地播放反对派的声明、讲话,以影响受众和选民,并唆使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冲击政府部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媒介宣传机器影响国际舆论,左右国际局势。格鲁吉亚等国作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之音等媒体的重点进攻。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对独联体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影响到那些接受前苏联教育较少、而对新鲜事物颇为好奇的年轻人。

美国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在这些国家时刻都得到体现。当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违背美国意愿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已宣扬多年的“自由民主”意识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美国媒体随即对美国所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希望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颜色革命”中发动了全方位的媒体攻势,“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接二连三地取得成功。而俄罗斯的大众传媒由于经济实力、技术、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无法给予有效的还击。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传媒力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西方大众传媒的强大攻势下俄罗斯大众传媒只能处于守势,并没有对独联体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起到遏制作用。

4. 关于“颜色革命”对我国媒体政策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大众传媒成为独联体国家反对派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和平演

变”和策动“颜色革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应引起我国传媒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颜色革命”对我国大众传媒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依法对大众传媒进行监管；开放传媒市场的同时警惕“别有用心”的国外资本；稳步推进新闻体制改革；把握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度；加强主流媒体建设，规范市场化媒体；提升新闻从业者素养的同时注意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提升我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了文献分析、基于抽样技术的内容分析和典型案例研究的方法。(1) 文献分析：广泛搜集了相关文献资料、统计数据，特别是利用精通外语的优势，充分挖掘了已有的外文文献，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梳理综述，以丰富的实例说明观点，对独联体国家的新闻体制和媒介生态以及政治发展状况进行分析；(2) 内容分析：关于媒体对“颜色革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采取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对《纽约时报》的“橙色革命”报道作了框架分析，遵循随机原则，按照抽样方法选取了一定样本，对样本内容进行了科学的量化分析，探讨媒体政治报道倾向、报道方式等问题；(3) 典型案例研究：围绕“颜色革命”这一研究主题，有目标地选取重点事件和媒体，进行深入的典型案例研究。

在研究实施中，我们在收集与“颜色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独联体国家相关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精通俄语、英语的优势，密切地关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媒体和政局的最新变化，努力获取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本书涉及的国家多、媒体多，处于转型期的独联体各国的媒介生态各具特色，格、乌、吉三国大众传媒在“颜色革命”中也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而这方面的资料在我国国内几乎是空白。我们通过扎实、细致的文献收集工作，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

四、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

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目前，国内尚缺乏关于大众传媒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系统全面的专门研究。我国学者对于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的研究成果过多地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如何操纵大众传媒掀起“颜色革

命”进而影响事发国的政局走向。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独联体国家近年来发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与转型期媒介发展的状况，尤其是传媒对“颜色革命”、总统大选、国家动荡等政局变化的作用机制，还没有作出及时的研究。

但是，欧美的国际组织对独联体国家的大众传媒及“颜色革命”却关注较多。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曾对独联体中亚各国的大众媒体进行过系统分析；美国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IREX）通过构建媒体可持续指数，对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东南欧（乌克兰）、俄罗斯及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媒介状况进行了评估；欧洲媒体研究所从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等角度对独联体国家的媒体进行了研究。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国目前关于独联体国家大众传媒的研究非常薄弱的现状，廓清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新闻体制转型与传媒发展的状况，揭示了各国传媒在“颜色革命”中的表现，并对“颜色革命”中传媒的作用作了评析，总结了“颜色革命”中的政治传播经验。如果从国内研究的不足与研究的必要性来看，本研究在选题本身和研究内容方面均是一种创新。

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本书把关于转型新闻体制的研究扩展到了独联体国家这一更大的范畴。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的新闻体制是趋同的。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各个国家因国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媒介发展道路，各国呈现的传媒景观有很大的差异。东南欧的乌克兰更多地走上了西方式的新闻发展道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显现出转型中的矛盾：观念先进，而业务落后，甚至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有传媒被一系列经济问题缠身而裹足不前。本研究通过细致的研究梳理，展现出了不同类型的转型国家的传媒发展模式。这是本研究的突出特色与主要贡献之一。

此外，我们把研究的另一重点放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的关系上面，揭示了西方国家利用传媒在独联体三国策划和组织“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的方式手段，分析了“颜色革命”给独联体国家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与教训，为我国大众传媒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媒体渗透，开展舆论斗争提供了参考意见和政策性建议。这是本研究的另一贡献所在。

本书对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的研究，从传播学、政治学、国际关系

等多学科的视角入手,运用政治传播学原理阐述了大众传媒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转型体制下媒介对社会政治发展与变革影响的理论,深化媒介控制对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作用的理论认识。这是本研究在理论贡献上所作的努力。

五、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

对于现在来说,“颜色革命”是曾经发生的事。对“颜色革命”的事后研究使研究者不能直观、动态地观察事件的发展,只能借助于文献资料的记载功能,重现当时的情景并予以研究,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很难做到全面、客观。由于语言(尤其是格鲁吉亚语、吉尔吉斯语)、时间、空间的限制,以及手头所掌握资料的有限性,影响了我们对这一宏大问题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对二手资料的整合与分析来展开我们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方面,利用政治传播这一核心概念,将大众传媒和政治联系起来,通过对“颜色革命”中各方传媒力量角逐情况的描述,试图说明大众传媒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机制。不过,本研究在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上还可以再有所拓展。在定量研究方面,我们对《纽约时报》的“橙色革命”报道作了量化的内容分析,以此透视美国利用新闻媒体柔性干预他国内政的具体操作手法。《纽约时报》数据库的全面与开放的特点为我们的量化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独联体国家的媒体(包括俄罗斯媒体)不具备这样的研究条件,使得研究者无法对其进行量化研究,这造成了本研究无法弥补的一个缺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动因与影响	1
第一节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爆发的背景	1
一、“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的由来	1
二、“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接连发生	4
第二节 “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爆发的原因	6
一、外部因素	6
二、内部因素	10
第三节 “颜色革命”对本国、地区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14
一、“颜色革命”对发生国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影响	14
二、“颜色革命”的国际政治影响	16
第二章 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理论基础和总体分析	18
第一节 大众传媒与政治传播	18
一、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功能	18
二、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第二节 作为“革命”手段的大众传媒	23
一、大众传播媒介与“革命”	24
二、大众传媒作为“革命”手段的宣传特性	27
三、大众传媒作为“革命”手段的实现路径	29
第三节 大众传媒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分析	34
一、反对派媒体大行其道	35
二、独立媒体偏袒反对派	37

三、西方媒体垄断国际舆论	38
四、政府媒体势单力薄	41
第三章 格鲁吉亚大众传媒与2003年“玫瑰革命”	42
第一节 格鲁吉亚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	42
一、格鲁吉亚概况	42
二、格鲁吉亚传媒生态图景	44
三、格鲁吉亚独立后大众传媒的转型	49
第二节 “玫瑰革命”中的格鲁吉亚大众传媒	51
一、“玫瑰革命”事件回顾	51
二、“玫瑰革命”中反对派赢得私营媒体的支持	54
三、“玫瑰革命”中政府方面试图掌控舆论	55
四、格鲁吉亚媒体在“玫瑰革命”中的作用评析	56
第三节 “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的社会发展与媒体环境	58
一、“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的社会发展	58
二、“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的传媒环境	61
第四章 乌克兰大众传媒与2004年“橙色革命”	64
第一节 乌克兰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	64
一、乌克兰概况	64
二、乌克兰媒体发展状况	65
三、乌克兰独立后的传媒体制	74
第二节 “橙色革命”中的乌克兰大众传媒	78
一、“橙色革命”事件回顾	78
二、乌克兰大众媒体上演“传媒界的橙色革命”	81
三、“橙色革命”中新兴网络媒体的运用	88
四、独立媒体与反对派媒体、西方媒体合力助推事态发展	91
五、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的政治传播经验	93
第三节 “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的政局走向与传媒格局	94
一、扑朔迷离的乌克兰政局走向	94

二、媒体、资本、权力的交织：透过 2010 年总统大选看乌克兰传媒格局	97
第五章 吉尔吉斯斯坦大众传媒与 2005 年“郁金香革命”	109
第一节 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	109
一、吉尔吉斯斯坦概况	109
二、吉尔吉斯斯坦传媒业概况与特点	110
三、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传媒体制的转型	115
四、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外国媒体与外国基金会	123
第二节 “郁金香革命”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大众传媒	127
一、“郁金香革命”的起因与经过	127
二、反对派媒体与独立媒体：“郁金香革命”的催化剂与加速器	130
三、经济问题缠身的国有媒体在“郁金香革命”中羸弱无力	132
第三节 “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发展与传媒动向	134
一、“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故态复萌	134
二、媒体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与集中	135
三、穷媒体、无序民主与国家动荡：解析 2010 年政变中的传媒之争	138
第六章 西方国家大众传媒与“颜色革命”——重点对美国的分析	148
第一节 美国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	148
一、美国的地缘战略观	148
二、美国对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概述	150
三、美国对独联体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动因	159
第二节 美国对独联体国家的媒体渗透	162
一、美国对独联体国家媒体渗透概况	162
二、美国进行媒体渗透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170

第三节 西方媒体与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	179
一、“颜色革命”中的西方媒体	181
二、西方媒体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184
三、西方媒体助推“颜色革命”的主要手法	187
第四节 “颜色革命”背景下美俄博弈中的媒体之争	188
一、美国与俄罗斯媒体力量对比悬殊	188
二、俄罗斯大众传媒对“颜色革命”消极应对	189
 第七章 西方媒体“颜色革命”报道框架分析——以《纽约时报》 “橙色革命”报道为例	192
第一节 研究设计	192
一、理论依据	195
二、研究方法	198
第二节 《纽约时报》“橙色革命”报道的表层框架与深层框架	203
一、对主体研究时间段——“橙色革命中”的表层框架分析	203
二、对主体研究时间段——“橙色革命中”的深层框架分析	211
三、对“橙色革命前”、“橙色革命中”、“橙色革命后”的 对比分析	229
第三节 政治新闻架构中的画框隐喻	239
 第八章 “颜色革命”中的传媒角色对中国媒介发展的启示意义	243
第一节 独联体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	243
第二节 消解“颜色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的传媒策略	244
第三节 “颜色革命”中的传媒现象对中国的启示	245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71

第一章 “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动因与影响

第一节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爆发的背景

一、“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的由来

政治斗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舆论斗争、街头政治、暴力革命等。从矛盾激化的程度上来看，街头政治属于中等严重程度的级别，一般的政治原则鼓励街头政治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避免流血冲突，但也有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暴力革命的可能。

“街头政治”因为政治斗争的地点多发生在街头而得名。“街头政治”通常是指某些政治势力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发动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或围困、冲击政权机关的活动。^① 政治势力在某种突发情况下或者经历了一些其他基础形式的政治活动之后，比如通过正常的程序向政府、法院等部门反映问题，以及通过大众传媒引起舆论探讨和争辩，矛盾仍然无法解决或者矛盾激化，于是诉诸相对更加激烈的抗争形式，表达反对意见和不满情绪。“街头政治”的具体表现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集会、举办街头讨论或组织辩论演讲、发起街头签名活动、搞群众性串联、罢工罢课、静坐绝食、占领广场、围困或冲击政府机关等。这些是常见的、一般意义上的“街头政治”的表现形式。^②

在当今时代，“街头政治”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取得一定的政治斗争效果，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

① 南菁：《浅议街头革命》，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7期，第42页。

② 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务必高度警惕街头政治》，<http://news.163.com/05/0516/14/1JSNKN4900011248.html>。

显，事发国的政府对人民的权利给予足够的尊重，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不会动用国家暴力机关来制止“街头政治”的发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事发国担心自身政权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形象和地位受损，忌惮于联合国以及美国等政治大国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当前有一种趋向，即越来越多的当权者因害怕国际制裁而不敢采用强硬态度对付“街头政治”。因此，“街头政治”就成为反对派向当权者施加压力的有力武器，尤其在近半个世纪里在一些国家频频出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诸国和苏联，人们在大街小巷游行，在中心广场集会，高呼“建立团结工会”、“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等口号，这种“街头政治”最终导致了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13个北约国家，对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进行了78天的狂轰滥炸。2000年九十月间，南联盟总统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科什图尼察的支持者不接受进行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在首都等各主要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最终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政权。在委内瑞拉，持有左翼立场的查韦斯执政以来，美国支持下的反对派发起多轮政治动乱冲击查韦斯政府，期间也有多次支持查韦斯的游行示威。在格鲁吉亚2003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指责执政党选举舞弊，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总统下台，11月22日反对派领袖萨卡什维利率领支持者冲进议会大楼，占领了国务院办公厅大楼和电视台，逼走了当时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除此以外，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都发生过“街头政治”的事件，其中有的国家成功地制止了“街头政治”，没有发生政权的更迭。

思考“街头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进行街头政治的政治团体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可以分为两种原因：一种可能是源自本国发展过程中内部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等方面的矛盾；另一种可能是受外国势力的挑拨和鼓动而对本国政府发起街头抗议等政治反抗活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两者兼而有之的可能性更大些。

在美国西化独联体国家的国际政治视角下，“街头政治”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名词，指称“颜色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有组织的群众性街头抗议活动。因此，“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可以作为近似的同义词来解释。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前者泛指一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围困冲击政府机关的政治斗争形式，可以在世界各地发生；而后者特指21世纪初，某些